

A 江边捡到的将军印

1982年的一天,刘定全无意中在江边发现了一块金光闪闪的东西。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拿着这个东西到河边清洗后惊讶地发现,这是一枚印章。这个印章十分奇怪,下半部分呈正方形,上半部分则被雕刻成一只乌龟的模样,底部还刻着几个大字,而材质可能是黄金。

刘定全向妻子分享自己的发现后,妻子直接将印章放进嘴里咬了一下,印章上留下了她的牙印,因此确定了这个印章是金质的。一传十,十传百,很快整个村子里的人都知道刘定全捡到金子的事情。许多想看热闹的人都来到刘定全家中想看一下宝贝到底长什么样子。

很多闻风而来的文物贩子也来到刘定全家中想要花高价买走这枚印章,但刘定全是个冷静的人,无论谁想要买走他都没有同意。一直到考古专家听闻此事后来到他家中,他才放心地将这枚印章交给专家。专家研究后才确认这是一件文物,是西汉时期的印章,根据印章上的字可以看出名为“偏将军印章”,具有非常高的历史研究价值,能为研究西汉时期的文化和官制提供非常重要的信息。得知文物的重要性后,刘定全将这件文物上交,希望专家可以将它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B 偏将军之名的起源

“偏将军”其名源于先秦,盛于两汉。起先“偏”为编制单位,如“五十人为偏”(《周礼·地官》);“其君之戒,分为二广,广有一率,率偏之两”(《左传·恒公十二年》)等。同样“偏”也有作将佐称谓,如“司马令尹之偏”(《左传·襄公三十年》);“是以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老子·道德经》)等。

从西汉始至魏晋时期,“偏将军”一职使用更盛。如《史记·陆贾列传》记载:“使一偏将十万众临越。”

镇馆之宝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篇

三国时期的金质官印—— 偏将军印章

来自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这枚金印上,有一只表情坚毅、严肃认真又呆萌的小乌龟。可它却属于三国文物里稀少的精品,是镇馆之宝之一。



C 金印见证三国历史

金制官印流行于汉晋时期,全国目前共发现26枚,两汉金印存15枚。“偏将军印章”传世多为银、铜质,重庆发现的这枚是目前所见唯一一枚金印。《汉仪》记:“汉兴,置大将军、驃骑,位次丞相,车骑、卫将军、左、右、前、后、皆金紫,位次上卿。”据考证,从新莽始,龟纽印的秩级比西汉略低,使用金印的制度也比西汉略宽。此金印龟纽头微昂,背圆,龟甲饰重环纹,制作精细。此类龟纽官印流行于西汉中期至东汉早期,但在两汉之交的战乱时期或有例外,出现金质“偏将军印章”也完全有可能。另外,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另藏有1954年陕西省宁强县阳平关出土的金质“朔宁王太后玺”1枚,朔宁王是东汉初建武七年被当时割据政权首脑公孙述封隗嚣的王号。此金印与“偏将军印章”金印在纽式、印体上如出一辙,可推断为同一时期,况且“偏将军印章”的印文用字又与同时期可断定的印文风格一致。因古时江州(今重庆)在新莽至东汉初年发生多次战役,如“夷陵战役”等跨越上述两金印出土之地,所以“偏将军印章”出土于重庆并不奇怪。

D 精妙绝伦的印章艺术

此枚“偏将军印章”凿刻谨严精巧,且新莽官印的制作技艺极为精湛,明显超过西汉或东汉后期。王献唐先生在《五灯精舍印话》中,对新莽时期官印有极高的评价,“新莽篡汉,百度维新,凡有制作,无不精美。印为国家重器,尤刻意求工。今传新莽官印,钮制冶炼,俱皆华妙。印文书刻之工,远迈秦汉,更无论魏晋。篆刻至莽,殆摹印之极规矣。”此印五字采用当时常见的三行排列方式。这种排列方式使得文字体势自然延伸,所占位置具有黄金分割特征,适合篆书的伸展,显得极为美观。通观此印,其凿刻工致峻拔,线条干净利落,有含和闲雅之致,给人赏心悦目之感。章法精巧缜密,篆法工稳谨严,笔画伸缩自如、不肆不拘,平直中略寓圆融之气。故而此印道媚独具,称得上清刚与婉约兼得。

总之,此枚金质“偏将军印章”从其艺术角度来讲,以其特殊的材质,高超的制作水平,舒展、沉稳、典雅而又精整的印文,一丝不苟、精妙绝伦的章法安排,使我们感受到了这一时期印章艺术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非凡的艺术魅力。(本报综合)

古来征战几人回? ——考古发现还原唐朝士兵戍边生活

新华社乌鲁木齐电(记者 张晓龙)1200多年前,唐朝士兵是如何在“大漠孤烟直”的边塞戍守的?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的发掘与初步研究,正在解开这一谜团。

这一烽燧遗址位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县东南90公里处的荒漠中。去年9月到今年6月期间,考古学者在此展开考古发掘。

“出土遗物和碳十四测年表明,烽燧遗址修筑于唐代,是安西四镇之一焉耆镇下为防止吐蕃入侵而修筑的军事设施。当年,应该是一处基层军事

机构‘游弈所’的驻地。”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考古工作队领队胡兴军说。

学者对出土纸文书、木牍初步释读后发现,孔雀河沿线烽燧遍布着各级军事设施,驻守在烽燧的士兵需按“值班表”定时外出巡逻,观察“楼兰路”上来往商旅情况,并搜集军事情报,还要在烽燧站岗放哨。

“遗址出土了保存完整、字迹清晰的木牍,上面记载着烽铺与游弈所间‘计会交牌’与平安火制度,士兵们很可能就是按照这些规章制度履行职责的。”胡兴军说。

烽燧遗址邻近罗布泊一带,自然环境恶劣。胡兴军说,烽燧西侧发现的三间半地穴式房屋很可能是士兵唯一的避暑场所。

烽燧附近还发掘出大量马鹿、野猪、天鹅以及多种鱼类的骨头。“从中原运来的粮食不一定充足,因此士兵需要猎取野味进行补给。”胡兴军推测。

“沙洲、河州、雍州、岐州、幽州……”透过埋藏在干燥沙土中早已揉成团状的账单、私人信札、书籍册页等纸文书,考古学者发现士兵的家大都相距遥远,真可谓“浊酒一杯

家万里”!

“兵源主要来自今天的华北、西北地区,按照当时的行军速度计算,他们从家乡赶到驻地,就要耗时数月。”胡兴军说。

烽燧遗址出土的纸文书还包括《孝经》《韩朋赋》《游仙窟》等。胡兴军认为,戍边官兵把一些典籍、文学及文化观念带到了西域,客观上促进了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

他表示,对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的发掘和发现,不仅有助于深入研究唐代边塞生活和军事管理制度,也实证了唐王朝对西域的有效管治。